

徐向前 陆定一 许德珩为本刊题词

目 录

写在《革命史资料》之前王首道 (1)

我的一段经历安子文 (3)

入草岚子监狱前后杨献珍 (6)

(一) 接受任务(7) (二) 饭店失约(8) (三) 赴
平接线(9) (四) 落入虎口(10) (五) 叛徒出卖
(12) (六) 秘密刑审(12) (七) 组织“翻供”
(14) (八) 开展斗争(15) (九) 学习马列(17)
(十) 出《红十月》(19) (十一) 识破特务(19)
(十二) 戳穿诡计(20) (十三) 营救出狱(21)

“关键一票”的由来

——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

.....朱仲丽 (23)

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黄鼎臣 (27)

(一) 国共合作时期, 东京特支领导下的留学生革
命活动(27) (二) 国共分裂后, 东京特支领导下的
社会科学研究社(30) (三) 成功的“三·一八”纪
念活动(33) (四) 反日大同盟的建立(34) (五) 我

被遣送回国 (36) (六) 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反日大
同盟上海分会 (38) (七) 反帝大同盟的建立 (41)

一九二八年以前上海工运的一些情况

.....张维桢 (43)

在同蒲线上王新亭 (62)

(一) 三打运城 (62) (二) 强攻“卧牛城” (67)

(三) 歼灭阎军野战集团 (71) (四) 群凶就缚 (74)

忆张秋人、胡公达烈士薛暮桥 (82)

华中局城工部三年张承宗 (87)

(一) 撤退 (88) (二) 顾家圩子——江苏省委干部
训练班 (92) (三) 华中局城工部——新四军调查研
究室 (97) (四) 组织地下军, 准备武装起义 (107)

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聂洪钧 (111)

大革命失败之后

——湖北松滋党组织的发展和

九岭岗起义黄杰 沈德纯 (116)

记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谭汤池 (121)

王光美同志及其兄妹参加革命的

前后经过王 新 (142)

(一) 名字里的奥妙 (142) (二) 天津秘密无线电
台 (144) (三) 光美对我们的帮助 (146) (四) “王
光超大夫诊所”——秘密联络点 (147) (五) 接受
新任务 (149) (六) 继续当好一座“桥”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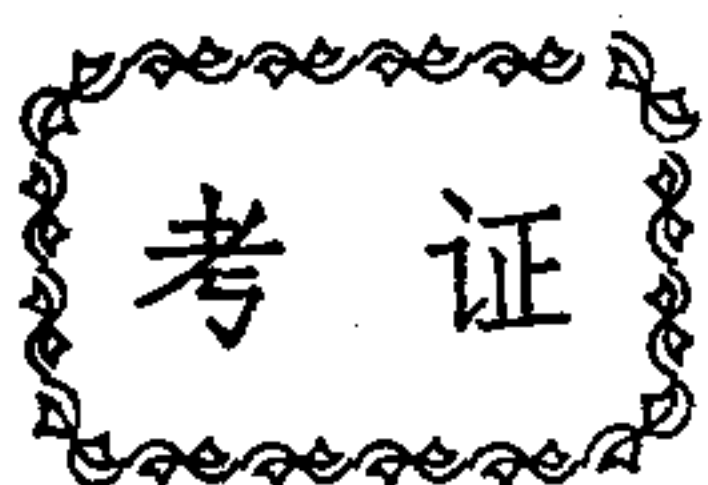
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王会悟(152)

宁死不屈的李联奎同志赵鹏飞(153)



于若木同志谈和江青的斗争

.....本刊记者(155)



王若飞同志在内蒙古地区

革命活动的若干史实史筠(162)

封面题字魏传统

写在《革命史资料》之前

王 首 道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革命史资料》丛刊。

文史资料工作自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这个事业也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工作停顿了十多年。

一九七八年五届政协恢复工作以来,政协委员中增加了相当一批老同志,他们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根据这个新的特点,文史资料工作增加了搜集、整理、编写中国革命史资料的新内容。

两年来,许多老同志和有关人员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撰写回忆录,提供革命史资料,有一部分已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但是还远远不能适应需要,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现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将部分革命史资料编成丛刊,公开出版。收集在这里的资料,主要是许多老同志以亲身经历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另外也配备一些有关的印证资料,以便提供历史研究者参考;并用真实的历史

资料，肃清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造成的恶劣影响，教育青年一代。

我们希望老同志以向后代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把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亲身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的经历记录下来。我想，在向四化进军的道路上，这也是老同志晚年应尽的光荣职责。

让我们共同努力！

我的一段经历

安 子 文

编者按：这是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回忆草岚子监狱斗争史实时，口述的一段本人经历。当时他已经重病缠身，住在北京医院。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安子文同志不幸逝世。我们发表他的这段回忆，以表达对这位党的杰出的组织活动家的深切怀念。

本文标题是编者后加的。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我在北京参加了共青团，当时叫CY。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在河南开封转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工作。

一九二八年春天，即入党后的第三个月，在开封被捕。因为我用的是假名子、假口供，敌人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只好把我押在看守所里。

第二年蒋冯战争，韩复榘倒戈，我出了监牢。接上组织关系后，到了上海，担任交通，往返上海和武汉、沙市。

一九三〇年八月间，组织上把我从上海派到了天津，在北方局担任交通科长。当时，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同志，组织部长是

阮啸仙，宣传部长是余泽洪。工作没有多久，又调我去担任阮啸仙同志的秘书，交通科长的职务便由周仲英同志来接替。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取消北方局，改称为顺直（河北）省委。省委机关设在天津。顺直省委书记由铁路工人出身的六大中央委员许兰芝担任，陈原道任组织部长，余泽洪任宣传部长，陈复任秘书长，我仍然担任组织部秘书。陈复去广东后，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不久，张国焘到天津，决定调我去中央特科工作。顺直省委秘书长职务由刘亚雄接替。

我正准备动身，组织上给我一项临时任务，让我组织“打狗队”，准备狠狠打击叛徒和内奸，一俟任务完成后，立即赶往上海。这时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贺昌同志负责北方局时，在法租界的一所大旅馆里曾租用了几间大房子，挂有“垦野公司”的招牌，实际上是北方局机关开会的地方。顺直省委成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地方，但又觉得此处用的时间长了不安全，决定撤消。周仲英同志到“垦野公司”去，不幸被敌人逮捕，我并不知道敌人在那里安下了捕网，心里还想：“垦野公司”有许多沙发、立柜、地毯、办公桌、小保险柜之类的物品，应当和旅馆结账，然后将所有物品拍卖。组织上当时是十分需要经费的。一天下午，我赶到了“垦野公司”，刚进屋就让早已埋伏好的特务们逮捕了。

敌人将我押往法租界工部局，审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忙编了一个假口供，说了个假名字。敌人又问我：“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刚下火车，从北平来这儿找朋友的。”

敌人劈哩拍啦打了我几耳光。再问我，我回答还是那几句

话。结果，他们又拥上来，动手打了我一顿。

在工部局押了三天，又把我转到了天津市公安局。三个月后，由于“交通”被敌人盯梢，顺直省委遭到大破坏，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也关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由于我是早被捕的，没有和他们作为一案。

后来，我们都转到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胡同监狱。陈原道、刘亚雄一案的同志，是“九·一八”之后不久判的刑，鉴于当时的时局正处于大动荡，敌人判的较轻，在“一·二八”后的一次大赦中便出狱了。我是在“九·一八”事变前被捕的，判的刑比较重，大赦减刑也出不去。敌人让我们“反省”，我们坚决反对，当然更不会出来了。因此，抱定决心“红旗出狱”。狱中，我和薄一波、殷鉴、杨献珍、胡锡奎、李楚离等同志一起，在秘密党支部领导下，团结广大政治犯，进行反对牧师说教，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和争取改善狱中生活等等斗争，还进行过一次大的绝食斗争，经过长达五年半的狱中斗争生活，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党组织营救我们出狱为止。

出狱后，我被留在北方局，后来又担任了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鬼子进占北平，我便由天津乘船到了青岛，又从青岛到济南，然后绕道去山西太原工作。

入草岚子监狱前后

杨献珍 口述

(全国政协常委 中央党校顾问)

编者的话：“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六十一个叛徒”案，对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许多同志进行了种种诬蔑，实行了残酷的迫害。



杨献珍同志在北京医院

本篇回忆录中，杨献珍同志以其亲身经历说明，这些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机智，被捕入草岚子监狱后，仍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是英勇不屈的革命战士。铁的事实完全揭穿了所谓“六十一个叛徒”的无耻调言。在入草岚子监狱

之前，杨献珍同志还有一段惊险的斗争经历……

接受任务

一九三一年初，在上海的党中央有个计划，准备在北方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其中一个能发挥重大作用的共产党员，是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过国会议员的胡鄂公，他在北方的上层人物中有很多熟人。中央决定让胡鄂公赴北方，以他的社会身份和关系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并派我做他的助手。

四月中旬，胡鄂公和我乘船从上海去天津。出发前，中央已获悉顺直省委在天津遭受严重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和陈原道、刘亚雄等分别被捕。一大批负责干部被捕后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里，法院刚刚受理案件，但还没来得及定案。这是一个机会，中央交付给胡鄂公和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法通过一切关系，尽一切可能营救天津被捕的同志出狱。

这时，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成立。省委书记殷鉴同志得知我们到达天津，立即委派省“互济会”党团书记赖德赶来，协助我们进行营救工作。

曾经当过天津市商品检验局局长的刘少白先生（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从北平赶到天津，为营救女儿刘亚雄、女婿陈原道等人到处奔走。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多方活动，终于使天津法院吐口：花四五千块大洋，就可以把陈原道这批人释放出来。刘少白、胡鄂公原来就是好朋友，刘少白便将营救的经过告诉了他。

胡鄂公听说营救有望，赶忙返回上海，亲自向中央报告。党中央听了胡鄂公的汇报以后，决定仔细研究一下。但是在这个期间，中央内部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负责中央情报工作的顾顺章

在武汉被捕叛变。受顾顺章领导的陈赓同志，在上海获悉情报大吃一惊。陈赓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一直在上海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打入敌人内部后常与国民党上层特务机关、租界巡捕房和下面的特务、包探打交道。顾顺章的叛变，使陈赓和特科的几位同志处境十分危险，他们迅速地离开上海而转移到天津。

我当时住在天津大同公寓，胡鄂公去上海还没有返回来，因此，陈赓等同志的到来由我负责接待。陈赓留下一名特科的王同志和我一块在大同公寓暂住，其它的几位同志，由他再设法安排。

饭店失约

一天清早，我买来几张当天的报纸，突然从《大公报》上看到了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昨晚在“汀州会馆”破获共产党机关……。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破坏了共产党组织，第二天就登报以示“功绩”。我看到这则消息，心中不免一惊，顺直省委书记殷鉴派来的赖德，不就是福建人么！他就住在“汀州会馆”，而且来过大同公寓，并在这里见过胡鄂公。莫非……。我当即告诉那位王同志。王同志常年在中央特科工作，为人十分机警、干练，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搬家转移。

我们搬入新居之后，我说要把新居地址告诉刘少白，以便他有事好找我。王同志说不行，不能把新地址告诉任何人，要我多往国民饭店去找刘少白。

一天，陈赓同志来到我们新居，要我明天八时带他到国民饭店去会见刘少白。第二天，我在家等候陈赓。约定时间过去了，一直到中午十二时他才匆匆忙忙赶来，说上午有人找他，一时脱

离不开。我也没说什么，便带陈赓赶到国民饭店。

但刘少白的房间已经上了锁。

我问茶房，茶房说：“刘先生一早就退了房间，走了。”

我问：“搬到哪儿去啦？”

茶房摇摇头，说：“不知道。”

不好再问下去，我只好带着陈赓离开了国民饭店。

赴平接线

原来，刘少白听到北平的风声，已经转移了。

顺直省委的活动经费，一直是由上海地下党中央通过刘少白转给陈原道、刘亚雄的。顺直省委在天津遭受破坏后，迁至北平，经费依然由刘少白转交给新省委书记殷鉴同志。从刘少白家转经费是绝密关系，只有殷鉴和省委秘书郭亚先知道。六月，顺直省委在北平遭受破坏。郭亚先被捕叛变，马上把刘少白这个关系向敌人告密，敌人当即派宪兵去刘少白家抓人，但刘少白不在北平。出事的当天夜里，刘家的一个男佣人偷偷地跑到了天津，在国民饭店找到了主人，便一五一十地报告了家里出事的经过。刘少白得知消息，马上迁出国民饭店，他想把情况告诉我，但又不知道我新搬的住处，只好不辞而去。

胡鄂公这时从上海回到天津，他找到我说，中央已经同意用钱赎买被捕的陈原道等同志，而且已经带来了款子，让我马上去找刘少白。

到哪里去找刘少白呢？我向胡鄂公讲述了这些天所发生的事情，并告诉他刘少白已经离开国民饭店，去向不详，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胡鄂公听说后，决定让我到北平走一趟，并告

诉我刘少白的家址——北平虎坊桥，现今的晋阳饭庄原址。

我想，刘少白突如其来地离开国民饭店，必有原因。该不是他家里出了问题？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胡鄂公，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不会，他家里会出什么事？你去找他好了。”

于是，胡鄂公将五份早就写好的《开展北方政治情报工作大纲》的小纸条交给我，并随手开了北平的五个关系让我去接头，指示我给每个关系人留下一份“大纲”。这五人中记得有张克侠、何基沣……等。胡鄂公又指示，接上头后，去找刘少白，然后留北平开展工作。

落 入 虎 口

七月二十四日，我从天津乘火车到了北平，住在一家公寓里。第二天，我就带着五份秘密的“大纲”，按照早已开好的地址、关系、暗号，挨个儿去接头。中午时分，已经见到了第四个关系人，他家离虎坊桥很近，也熟识刘少白。我便向他打听刘少白家里情况，关系人说刘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并说：“我认识他家，我带你去吧！”走到刘家附近，我让他回去，便自己朝刘少白家院子走去。

进了黑漆大门，看见门里影壁下有个老太太，便问：“刘少白先生家在这儿吗？”

老太太毫无表情地回答：“刘家在后院。”

我进院子前已经打定主意，先看看群众的脸色表情，来判断凶吉，因为我仍然怀疑刘少白突然离开国民饭店，必事出有因。但老太太木然的脸色，使我什么也看不出来，便一直朝后院走去。其实，就在两天以前刘锡五同志也是到刘少白家来，前院的

一位好心妇女用眼色暗示“刘家出事了，快跑……”。刘锡五同志十分警觉，知道势头不好，转身就走。谁料到正巧被宪兵看见，追出去将刘锡五捉住。尽管刘锡五不承认邻居“通风报信”，宪兵还是把那位妇女痛打一顿，并警告前院的居民，谁也不准再给“来人”任何暗示，否则以“通共产党”罪论处。

我并不知道刘锡五同志被捕这段事儿，刚才影壁下那位老太太脸上又没有什么反映，我就径直走到后院，到了刘少白家推门而入，只见年幼的刘竞雄惊恐地扑到妈妈怀里。一个宪兵坐在屋里，一个宪兵站在屋门后，我被堵在屋里跑不出去了。但我马上想到，身上还有一份情报“大纲”呢，如果敌人搜身就要坏事，必须设法消灭掉它。我一面随机应变地编着假口供，向敌人胡扯着，应付着……，一面打量着两个宪兵。只见一个宪兵走出屋到前院去，大概是打电话报告去了；另一个宪兵背着身，正在找纸片写什么“记录”之类，我就坐到椅子上，利用这个难得的好机会，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记录着“大纲”的小纸条，放进嘴里，偷偷地嚼着，最后竟吞了下去。身上任何可疑的证据也没有了，我这才喘了一口气，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

打电话的宪兵回来了，他们把我捆绑起来，带到大门口，雇了两辆人力车，一直拉到了宪兵司令部。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刘澜涛和孔祥祯同志，他们也被敌人逮捕，关在这里。

叛徒出卖

天黑的时候，敌人开始审讯我。审问官是李天明，他是个老叛徒，见了我，突然大声吼道：“把胡鄂公交出来！”

我心里想：敌人并没有从我身上搜出任何纸片，又没有同案

人，李天明也不认识我，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天津的活动？

我假装糊涂地说：“什么？”

李天明逼进一步，厉声厉色地叫着：“把胡鄂公给我交出来！”

我仍然装做不解，反问他：“什么胡鄂公？”

李天明冷冷一笑，指着坐在桌子后面的一个人，说：“你认识他吗？”

刚才被带进这间昏暗的审讯室，我并没有看清桌子后面坐的都是什么人，现在经李天明一指，这才抬起头望了望。原来，赖德就正襟危坐地坐在桌子后面。我恍然大悟，知道赖德已经被捕叛变了，冤家路窄，事情实在不妙，但仍硬着头皮说：“不认识”。

“什么？”李天明又指了指赖德说：“你真不认识他吗？”

我摇摇头说：“不认识。”

只见李天明手一挥，马上冲过来几个特务，把我按在地上，钉上了重脚镣，又连打带踢地把我推进了“密审室”。

秘密刑审

“密审室”其实就是刑讯室，屋里摆着各种法西斯刑具。敌人将我的胳膊用绳子捆绑好，单挂膀悬吊到屋梁上。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从房梁上放下来时，我的左手脖子已经骨折了。

“讲！胡鄂公在哪？”特务们仍然向我吼叫着。

我摇摇头，一言不发。

赖德跑来，赖声赖气地对我说：“老杨……”

我没等他说完，便怒不可遏地骂起来：“你给我滚开！”

李天明无奈，又把我带回审讯室，他把一张纸递到我的面

前，那是敌人已经写好的口供，让我签字画押。

我看了看，那纸上写的大意是：杨仲仁奉胡鄂公之命，到北平行刺张学良，煽动军警暴动，策动石友三叛乱……，云云。

我挣扎着抬起头，对李天明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这完全是你们的捏造。”

审问官笑呵呵地说：“好，好，这与你无关，只要你按个手印就行了……”

他的话音刚落，几个凶恶的宪兵就一拥而上，把我按住。一个彪形大汉揪住我的右手，硬掰开我的食指按上红印油，又强行在那张“假口供”上按了一下……。

第二天，敌人再次提审我。我还是一言不发，他们又把我弄到“密审室”动刑。这次敌人把我仰面按倒，一个宪兵用他那大拳头在我的大腿内侧来回滚动，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刑罚，只感觉双腿疼痛难忍，好象锯掉一样。

“说，胡鄂公究竟在哪？”敌人仍然逼问我。

我躺在地上，心想：一言不发不是办法，敌人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于是，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李天明十分清楚，按照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规定，下级工作人员不得过问上级领导的情况和住址。他们便不再追问我了。

后来，国民党法庭按照他们自己捏造的假口供，将我判了死刑。

组织“翻供”

一九三一年，顺直省委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破坏。第一次是在春季，被捕的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人。第二

次是在六、七月份，殷鉴同志任省委书记那一届省委。殷鉴同志被捕后表现的十分坚定、英勇，而省委秘书郭亚先、省军委书记廖化平、省“互济会”党团书记赖德、省团委书记李国玉等人则相继叛变。因此，在省委工作的同志一时被捕的相当多。薄一波、刘澜涛、魏文伯、孔祥祯、刘锡五、张友清等同志，都是这次被捕的。陈原道同志那一批被捕后，都关在天津市公安局；殷鉴同志这一批，都关在北平宪兵司令部，并被判了很重的刑，好多都是判的死刑。

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张学良的行营军法处把北平被捕的人都集中调到军法处看守所。由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乔国桢等同志秘密领导难友们搞“翻供”，敌人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审讯。军法处的法官都是东北人，而且多是些老头子，他们不象老叛徒李天明那样，对共产党内部的情况知道得那么多，对党内组织，特别对党的外围组织更是不甚了了。

一天，一个老法官审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在‘互济会’做点事。”

法官又问：“‘互济会’是干什么的？”

我说：“‘互济会’只是帮助被捕坐牢的人做些事情，比如救济他们的家属啦！给犯人送点日用品啦！”

法官听了，忙说：“这是好事情呀！那‘互济会’在官厅立案没有哇？”

我说：“大概没有吧。”

法官又说：“没有立案呀！那可是不合法……”

由于我们在军法处搞了“翻供”斗争，不久军法处就把宪兵司令部判的死刑案全部改判了。我由死刑改判为五年徒刑。